

张洁与俄苏文学

黄 乐 平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俄苏文学对张洁的影响,既来自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熏陶浸染,也来自于作家主动的接受与借鉴。总体而言,俄苏文学主要影响了张洁早期的创作,其中有俄苏文学优良传统被整体性潜移默化的方式消化吸收的情况,也有直接汲取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某些艺术精髓的方式。张洁之于俄苏文学,既显示了中外作家的文心相契,也于同中显异,突出了作家的创作个性。

[关键词] 张洁; 俄苏文学; 影响; 契合; 变通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5-0085-06

一

王蒙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从维熙、茹志娟、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1]如王蒙言,中国当代作家有相当一批的创作都留有俄苏文学的印记,这是时代文化背景影响的产物,也是作家主动接受的结果。

张洁出生于1937年,初登文坛到了1978年,文学创作的脚步一开始未能赶上同时代的王蒙等作家。但是她的文学梦(从中学始)却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时代赋予她的文学熏陶和资源背景和同代人王蒙等相同。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因为国运相似,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深层心理的相通,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认同了俄苏文学。1949年10月《人民文学》的发刊词写道“我们的最大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2]由此发端一直贯穿整个50年代,俄苏文学的译介与传播继“五四”文学革命后又一次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

所以,张洁接受俄苏文学,首先来自客观历史文化语境。得益于时代,在张洁成长为优秀作家的第一站,俄苏文学就给了她丰富的生活感悟和艺术熏陶。在一些文章中,张洁深情地回忆了年轻时接触

俄苏文学时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对她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深远影响。她在《读书的历史》这样说“年轻的时候读书,过目不忘。记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我可以整页、整页地背出,当然也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摘下很多书中精彩的句子。……到了初中,可读的书就更多了,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马特洛索夫的一生》、《古丽亚的道路》等等。……大学时代,我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房东》、《死囚日记》等等。……这些书现在的年轻人看不看,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由这些书哺育成人的。所作所为,无不带着这种精神烙印,至今难改。”^[3]

显然,俄苏文学对张洁的影响是旷日持久、根深蒂固的。它不但开启了张洁创作的艺术之窗,更重要的是也开启了张洁文学的灵魂之窗。

二

鲁迅先生指出“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4]美国学者爱德华·詹姆斯·布朗认为“俄国作家不仅满足了美学经验,也满足了思想的需要。大多数作家都充当了教育者和鼓舞者的角色……”^[5]王蒙的观点“我觉得苏联文学的核心在于正面人物,理想人物,正面典型,‘大写的人’等等范畴。他们肯

[收稿日期] 2011-09-08

[作者简介] 黄乐平(1971-),女,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定人、人生、人性、历史、社会的运动与前进……他们极善于把政治上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忠贞与爱国主义、与对于白桦树和草原的依恋、与对于人和人性、人生的天真的勃勃有生气的肯定结合起来。”^[1]三位学者用不同的表述,概括了俄苏文学的特质:崇高的人格力量,深沉的道德感,浓郁的抒情性,诗意优美的格调。

这种传统正是俄苏文学之所以格外能够打动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缘由,它在塑造中国文学现代品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俄苏文学的优良传统出发,比照张洁的文学创作足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借鉴俄苏文学时,除了时代氛围的浸润,显然张洁也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创作时段上。总体而言,俄苏文学对张洁的深刻影响集中在她创作的早期,中、后期的她主要受欧美文学影响。二是她分别从不同的俄苏作家作品中吸取多种营养,而非单一的追求与某一作家作品的相通或相似。俄苏文学对张洁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染和整体性的思想和艺术的熏陶。这种情况,就是王蒙所说的“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1]

因而,张洁喜欢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喜欢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她早期的文学创作,杂取了俄苏多位作家的艺术精髓。通观张洁文学创作之初的作品,那种以“人”和“爱”为思想主题、鲜明的理想主义倾向、古典忧郁的情怀、清新单纯的风格,俨然和俄苏文学传统一脉相承。

因此,张洁借鉴俄苏文学不仅得其皮毛,而且得之神韵,使得她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别具一格。

三

“似乎相当一批作家都是从清新美好起步的呢。个中的原因之一应该说是苏联文学的影响。我至今不能忘怀初读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时候的激动。”^[6]对《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阅读感受,广大读者和王蒙是一样的。它出现在1978年,同年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既是张洁的发轫之作,也是张洁创作受到俄苏文学直接影响的典范,意义深远。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个简短的小故事。老音乐家梁启明被打成“黑线人物”下放到林场劳动改造,并且身患癌症。在生命不多的时日里,他争分

夺秒地把自己的音乐造诣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粉碎“四人帮”后,孙长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参加音乐学院的考试,他的精彩演奏和质朴明亮、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精神征服了主考教授傅涛,也让所有的竞争对象都成为他的同盟军和朋友。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属于当时的主流文学——“伤痕文学”,主题思想并无独到之处。确如张洁的自述“并没有新的故事、新的情节、新的人物。”^[7]但和其他“伤痕”作品不一样的是:同是揭露文革的荒唐黑暗、直面无情的现实,张洁却没有加入控诉声讨的行列。《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里既没有血淋淋的鞭子和创伤,也无愤怒的呼喊与痛苦的尽情展览。张洁以她娓娓动人的叙述,温柔忧伤的倾诉,一点一点地展示着梁启明高尚的人格、孙长宁对老师的深情依恋、还有壮丽迷人的大森林……这些都是那艰难岁月里依然留有的生活美、人性美。所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既是忧伤的又是美丽的、温暖的。

这种独具匠心的处理,一方面使得作品保有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主流文学的基本特色——鲜明的政治感、时代感,又同时兼有了俄苏文学的伟大传统:道德感、人情味乃至批判现实主义。尤其是《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将道德、理想观念融入其中,突出美与善的高度统一。而这恰好体现了20世纪以来,苏联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传统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三者共存相融的方式。与当时盛传的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作品创作思路与方法一致。可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直接脱胎于俄苏文学,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消化。

作为一个对社会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张洁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为模式,紧接着又写了一系列作品,把俄苏文学中强调人情、人性、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以及强大的抒情性做了更大范围的发挥。如《忏悔》通过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某刊物的主编,在22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和恢复党籍的时候,因为偶然的原因而失去心爱的儿子,而引起的忏悔之情。既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扭曲,又展示了人物努力追回丧失了的高尚情怀。

《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执着圣洁的生死之恋,批判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不道德。在主人公矛盾痛苦的煎熬中,又表现了他们克己自制的高尚情操。《路》从一个画家几段现实生活场景与他回忆中的生活场景的比较、思考,针对“文化大革命”践踏美好人情的兽行,发出了人情回

归自然纯朴的呼唤,人们心灵深处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这些小说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重视发掘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寄予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感情,以及对美好人性、人生、时代的追求。与俄苏文学中契诃夫淡淡的哀愁,托尔斯泰作品中人性的复活和悲悯情怀等等,都遥相呼应。

《沉重的翅膀》,这部长篇主题重大,人物众多,生活面广,是一反映改革斗争生活的触世之作。但和同期其他作家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新星》等“改革小说”不同,它对时代面貌的反映,主要不是通过对社会矛盾和重大事件的深刻揭示来完成,而是通过对时代情绪和时代气氛的充分传达来实现。因为题材重大,张洁对一些有志之士(郑子云、陈咏明)等热切盼望工业改革顺利进行的激情表述极为强烈,别有一股激励人心的力量。《沉重的翅膀》的扉页上有一句热情洋溢的话语:“谨将此书献给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这种“改革家之歌”的模式,和苏联文学中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英雄之歌”一脉相承。显然,早期的张洁用笔“干预生活”,充当了中国社会的“教育者与鼓舞者的角色”,尽得俄苏文学风流。

四

契诃夫善于选取“小人物”作为题材。他对小人物的关怀不只灌注一腔的同情和怜悯,还以冷静的笔墨展示他们的缺点和不知不觉悟,这种思想贯穿在他整个的创作中。在契诃夫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有着完美人格的人物,都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如:“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欺下媚上;“套中人”别里科夫的愚昧保守、怯懦胆小;“普利西别耶夫中士”的迂腐冷漠、甘当奴才等,都是典型代表。契诃夫说“我只想诚实地告诉人们‘看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和无聊!’最主要的是要懂得这一点;而一旦他们懂得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会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美好的生活。”^[8]契诃夫用外冷内热的古道心肠来刻画他笔下的“小人物”,使得小说产生了“含泪的微笑”独特艺术效果。

这一方面,张洁深得契诃夫的精神与方法,并把他视为圭臬,很好地运用到自己早期的短篇小说人物塑造中。和契诃夫一样,张洁以表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见长。她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身处社会底层,没有突出的才华,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乒乓球陪练员(《含羞草》),汽车售票员

(《谁生活得更美好》),图书馆员(《有一个青年》),服务员(《白玉兰》),卖灶糖的老汉(《拣麦穗》),伐木工人、“黑线人物”(《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雨中》)等等。有些还是“问题”人物,身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如:行为粗鄙、缺少教养的青年焊工明华(《有一个青年》),生性执拗的、拉大幕的老田头(《非党群众》),玩世不恭、沉溺于打牌、抽烟的驾驶员鸭舌帽(《雨中》)。

对这些人物,张洁都投以善良的目光,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畸形社会历史予以含蓄的谴责,表现出一种“温柔的感伤”艺术特征。“温柔的感伤”准确地领悟了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真谛,同时又出其右,褪去了“含泪的微笑”中的嘲讽幽默,更具女性作家的善解人意、温和细腻。

在塑造“小人物”方面,张洁不全是象契诃夫那样,只着重关注这些“小人物”的弱点与陋习,表示出同情和批判。而是更多的表现这些外表普通的人物高贵的心灵世界。肯定他们的纯朴、善良,赞美他们助人为乐的牺牲精神。例如:朴实、憨厚的顾大江(《含羞草》)毅然牺牲了个人名利,默默地为同事争夺冠军铺路垫基;三十年埋头拉大幕的老田头(《非党群众》),他的认真到近乎执拗的敬业精神;通过自己平凡的工作去爱护人、关心人、体贴人的依伯(《依伯》),作为一个招待所的餐厅服务员,他为北方客人特意准备蒜瓣、为生病的客人端一碗面条,让人感到象回到母亲的身旁一样亲切温暖,象白玉兰般优雅的年轻女服务员(《白玉兰》),只是远远的关心着别人,从不过分热情亲昵。即使是表面待人冷漠的驾驶员鸭舌帽,作者也通过他在雨中主动送人表现了他内心潜藏的质朴和善良。张洁以她的锐利眼光,抓住了这些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哪怕是闪光的瞬间而热情地加以讴歌,这就使她笔下的人物有着深刻的感染力。她说“我生活在普通人中间,感受着他们的欢乐与悲哀。我要写出他们美丽的灵魂。”

张洁笔下的人物还表现出了执着追求精神丰富的内向性特点,这也是和契诃夫不一致的地方。这些人物不受现实所困,有着比现实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类人物刻画最深的是曾令儿(《祖母绿》)和钟雨(《爱,是不能忘记的》)。以曾令儿为例,她是一个渔家女儿,也是一位知识女性。不仅有漂亮的外貌,更有美丽的心灵。在她被爱情毁灭一切包括政治生命、名誉、地位、唯一的孩子乃至爱情本身时,她没有抱怨愤恨,而是用“祖母绿”宝石般“无穷思爱”的美德包容一切苦难,成为了东方的圣母玛利亚。这些

温暖的画面和人物,使得张洁受益于契诃夫又有别于契诃夫,体现了作为当代一个优秀女性作家良好的创作禀赋和多元的文学素养。

高尔基列举了契诃夫作品中形形色色人物后形象地说“在这一群软弱无力的人的厌倦的灰色行列前面,走过一个伟大、聪明、对一切都很注意的人,他观察了他祖国的寂寞的居民,他露出悲哀的微笑,带着温和的但又是深重的责备的调子,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一种绝望的苦恼,用了一种好听的、恳切的声音说‘诸位先生,你们过的是丑恶的生活!’。”^[9]黄秋耘先生在看了张洁作品中的人物后,写道“她的是非观念和爱憎之心都是非常强烈的,她很关切普通人的命运,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回避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不过,她很少从正面写,更多地是从侧面写……文学作品当然应当干预生活,但干预生活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张洁同志是以‘契诃夫的方式’来干预生活的,她轻轻地叹着气对那些应当受到谴责的人们说‘同志,你生活得不那么好!’”^{[10]5-6}

两段精彩的评述,指出了俄苏文学对中国作家的深刻影响,也昭示了以张洁与契诃夫为代表,中外作家之间志趣相投、文心相契的玄妙。

五

清新的艺术风格,同样是俄苏文学的深厚传统。20世纪50、60年代在中国文坛很流行的小说《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草原》、《白轮船》、《麦田里的守望者》等都有这样的特色。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诗篇,同样深情自然。这些作品,语言清爽新鲜,意境幽美,散发着勃勃的生机。尤其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对中国作家影响很大。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对俄罗斯大自然进行了生动而诗意的描绘。摇曳多姿的森林、辽阔丰润的草原、繁星闪烁的静夜、晨曦初露的清晨,婉转歌唱的群鸟、舒卷自如的白云,都向人们展示了无穷魅力。大自然不仅仅是美丽的景物,更是焕发着生气的生命体。它有着与人一样的性灵,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打破了传统中自然环境只是单纯的人物活动或主题思想的背景陪衬,是简单的象征的写法,而让它与人的内在心灵一起律动,富有生命生活的丰富含义。

在张洁早期的创作中,对美的自然风光的描绘和人性的善与美的展现相辅相成,明显受了屠格涅夫的启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作

品。宁静优美的大森林、美妙悦耳的长笛声、高尚纯洁的人格精神,三者交相辉映,构成了如梦似幻的意境。

另外,张洁的很多作品以自然景物来命名,也是这一特色的直接体现。如《白玉兰》、《含羞草》、《雨中》、《漫长的路》、《挖荠菜》、《我的四季》等等。她总是将人物的情操、性情置于自然景色中,自然环境往往成为揭示人物灵魂的点睛之笔。《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里高尚无私、乐于奉献的梁启明,他的人格和音乐就像“在阳光的照耀下,森林、田野、山峦、河流、湖泊……显现着越来越绚丽的色彩和磅礴的生命力。”^{[10]15}《白玉兰》中的年轻女服务员,虽然读过并喜爱作者的文章,但却从来没有显出任何不寻常的热情和亲昵,不肯打扰作者的思绪,而只是远远地关心着你,如同那白玉兰,只是微微地把淡雅的芳香送给你。《梦》里那个永远没有长大、永远没有变老的我,看着“变幻的云朵,悠悠地从我的头上飘过,心里突然变得甜蜜。”“她笑着,从我的身旁飞快地跑过。跳过小溪,跑进树林里去。浅蓝色的衣裙在树干后面闪动着,留下了一路天真的笑声。”^{[10]173-174}面对大自然,张洁把自己的温柔多情投入其中,细细地感受、描摹,使得作品呈现出极大的生命张力,同时又纯净诗意,具有“永恒的单纯”之美。这实际就是对俄苏文学“清新”风格的生动再现。

六

上大学时,张洁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而,陀氏成为影响张洁的一位重要作家,考察她早期的文学创作就可洞见。在俄苏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在于他的博大的人道精神,在于他替被侮辱的上帝之子说话。他用近乎残酷的笔触试图去发现人的秘密,对人类灵魂进行严酷审视,然后再寻求“人”的价值信念。

因此,陀氏最擅长对他笔下的人物进行细致冷静、精神心理分析解剖,展现人性的复杂。《死屋手记》、《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都堪称经典。

他既能捕捉罪孽深重者灵魂深处尚存的些许良知,又能透视德行高尚者内心潜藏的邪恶。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道德极端堕落,行为极端罪恶,但他无时不刻不在冷酷地怀疑自己解剖自己,尚未泯灭羞耻之心,以至精神分裂。又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至纯至善,但身上同样流着奢侈放荡、残暴不仁的卡拉马佐夫家族血液。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冰冷的心理手术刀”,切开了人类甚

深的灵魂,使人看见了魔鬼与上帝共同主宰着的最真实的人性。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博大深邃的。

而张洁对此的接受和解读,却是从更感性、更具体的角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了跨时空对话。

借鉴陀氏通过透视人的心灵深处写出真实人性的手法,张洁在创作中注重剖析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从而更好地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抒发感情。她说:“我的小说实际上不讲究情节,我更重视的是着力描写人物的感情时渲染出一种特定的气氛,描述人物所处的环境,以期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11]《忏悔》以一个父亲对不幸离世的儿子的追思和忏悔为线索,全篇采用人物独白的方式,将一个有着二十多年的党龄的共产党人与一个拳拳爱子的老父亲在动乱年代的矛盾痛苦内心展示得淋漓尽致,深沉的忏悔令读者感叹唏嘘。《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对兰英姐姐“温柔而伤感的回忆”,既痛心于“旧的生活摧残和扼杀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也摧残和扼杀着不知多少个曾经是那么美丽的、可爱的少女”,也憧憬于新时代“一定会把一个更优美、更动人的新生命重又给予我那兰英姐姐!”其他如《漫长的路》、《用三根弦奏成自己的歌》、《未了路》、《让我忘记》、《梦》、《我不是个好孩子》等都表现得很鲜明。

这些小说探讨的是一些社会问题,作者将笔锋深深地伸进了人的感情最为隐秘的角落,暴露问题往往力透纸背。

当然,这一写作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爱》,极其淡化情节,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女作家钟雨和一个老干部彼此在心里苦苦相恋了很长岁月,即算老干部去世后,钟雨依然深深爱着他,直至离开人世。这是个爱情悲剧,揭示了婚姻与爱情分离的社会现象,宣传了以爱情为婚姻唯一基础的人生理想。因为小说的人物身份触及到了“婚外恋”的社会敏感神经,为了彰显真正的爱情不是庸俗败坏,而是神圣纯洁的思想倾向,《爱》通篇采用第三人与第一人的意识流重叠交错的方式,将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心迹展览无遗,感人至深。小说这样写道“我独自一人,走在我们唯一一次曾经一同走过的那条柏油马路上,……我每每在这条小路上徘徊、流连,哪一次也没有象现在这样使我肝肠寸断。那时,你虽然也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便觉得你在伴随着我,而今,你的的确确不在了,我真不能相信。”^[10]¹¹⁸“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

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的,等着我,我就要来了——。”^[10]¹²⁰掏心掏肺的诉说,读者看到的是爱与美觉醒后的执着。这种觉醒是人的觉醒,这种执着,也是人的执着。

尽管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但张洁并没有机械地模仿陀氏。因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国情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性别,张洁对人性的探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总体上,张洁对人性的展现还是比较单薄,类型化、脸谱化比较明显,远不及陀氏的深刻、复杂与绝妙。所以,张洁也就没有创造出《罪与罚》、《白痴》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经典。

但是,相对于陀氏执着于残酷冷静地暴露人精神的异化、疯癫,张洁笔下的普通人则更为亲切亲和,也更贴近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女性作家,张洁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剖析也是陀氏所不及的。

综上,从以“人”和“爱”为思想主题、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到古典忧郁的情怀、清新单纯的风格;从契诃夫、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本文中无法穷举的其他因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洁与俄苏文学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以接受、借鉴俄苏文学为契机,张洁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走上了世界性文学之路。她的《我的第一本书》结束语是这样写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想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个人类,我爱人类,关心着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我将尽终生的力量为人类而写作,因为我是从普通人当中走出来的。”^[12]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张洁与俄苏文学共同的不朽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王蒙.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J]. 读书, 1993(7): 55-56.
- [2] 人民文学编辑部. 发刊词[J]. 人民文学, 1949(1): 1.
- [3] 张洁. 读书的历史[J]. 随笔, 1994(3): 27.
- [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73.
- [5] 薛君智. 欧美学者论俄苏文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48.
- [6] 王蒙. 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M]//张洁.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 381.
- [7] 张洁. 张洁小说剧本选[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1980: 1.
- [8] 陈国恩等. 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04.
- [9] 高尔基. 回忆契诃夫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502.
- [10] 张洁. 爱, 是不能忘记的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0.
- [11] 何火任. 张洁研究专集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101.
- [12] 张洁. 我的第一本书 [N]. 辽沈晚报, 2001-04-13.

ZhangJie and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 and Soviet

HUANG Le-p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 and Soviet has a great impact on Zhangjie. This affection not only comes from the edification in the era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also from the acceptance and the reference by the author. As a whole, the main affection from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 and Soviet to the previous creation of Zhangjie includ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 and Soviet absorbed by the unconscious influence entirely, and the essentials from Chekhov, Turgenev, Dostoevsky and the other great author direc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eation from Zhangjie combined with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 and Soviet have displayed the mutual affinity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 and the foreign author, and the unusual of her own creation, and highlight the creating personality of the author.

Key words: Zhangjie; the literature of Russia and Soviet; affection; fit; flexible

城镇化进程与社会福利水平

王伟同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中国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体制,容易让人做出城镇化进程会提高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逻辑判断。但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加,以及政府支出向民生领域的不断倾斜。而城镇化进程本身并没有起到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的作用,即没有给予新增城镇人口以原有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待遇。与此相反,现有城镇化模式还降低了总体公共服务水平,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表明我国原有城乡二元公共服务分配结构没有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改变。原有农村居民没有从由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的身份转换中得到显著的福利改善。这种脱离公共服务体制下的人员福利结构被固化,不利于城市不同户籍人群间的和谐共处,也不利于城市自身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因此,当前我们需要对现有城镇化道路加以反思。